



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和系统阐述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一重要思想，既有认识论又有方法论，既有宏观层面的整体指导又有具体层面的实践路径，充分表明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鲜明特点。

体用范畴的涵义及其关系

“体”与“用”是中国哲学特有的一对范畴，也是最能体现中华民族思想智慧的范畴之一。西方哲学谈的是本体与现象，印度佛教谈的是法性与法相，中国哲学讲的则是体与用。体用观念或思想出现很早，孕育于先秦典籍中。《周易·系辞》讲“神无方而易无体”；《道德经》讲“弱者道之用”；《论语》讲“礼之本”“礼之用”；《荀子·富国》讲“万物同宇而异体，无宜而有用为人，数也”。但是直到魏晋时期，“体”“用”才成为一对重要的哲学范畴，受到广泛关注和研究阐释，对以后的中国哲学、中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到了宋元明清时期，体用已然成为不同流派哲学家、思想家普遍使用的范畴，宋明理学更是把体用的哲学探讨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近代以来，面对西方文化的巨大冲击，中国思想界关于本末、体用、道器等方面的争论日趋热烈，在体用方面形成了不同的理论主张。总之，体用是中国哲学的一对范畴，有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也呈现出不同的涵义。大体说来，主要有3个层面的内涵：第一，“体”指实体、主体、形体等；“用”指作用、功能、属性等。体一般指有形质的、可感知的具体事物，是独立存在的对象，用就是该事物的实际作用、功用。“如这身是体，目视、耳听、手足运动处，便是用。如这手是体，指之运动提掇处便是用。”第二，“体”指本质、本原等；“用”指现象、表象等。这里的“体”不再指某一个具体的有形的物质实体，而是指万事万物的共同本质，是最高本体或本原。这里的“用”则是指本体所派生出来的宇宙万物、外在现象。程颐在《易传序》提出：“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

（上接1版）
从实践逻辑看，新时代党员干部“三观”是应对重大考验、完成使命任务的需要。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面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面对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前所未有。党员干部唯有树立正确“三观”，始终保持锐意进取、敢为人先、迎难而上的奋斗姿态，才能在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中积极担当作为、敢于善于斗争，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与此同时，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当前干部队伍中不愿担当、不敢担当、不会担当、不善担当的问题还比较突出。这其中既有态度和认识的问题，也有工作作风和能力水平的问题，归根结底是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发生了偏差。新时代党员干部“三观”的提出，既是我们党经受住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重大考验的必然要求，也是坚守初心使命、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现实答案。

新时代党员干部“三观”立起了新时代党员干部修身立业的根本标尺

新时代党员干部“三观”系统阐述了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的核心要义，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为新时代党员干部修身立业立起了政治标准和行动标尺。

统一性是新时代党员干部“三观”的内在特质。新时代党员干部“三观”深刻回答了“权从何而来、权为谁而用”“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

如何理解“明体达用、体用贯通”？

思想

通信

提问：尼玛多吉 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

最近在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其中提到“明体达用、体用贯通”这样的话，请问如何理解“明体达用、体用贯通”？

解读：唐爱军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至微的“理”就是“体”，是最高精神本体。至著的“象”则是体所派生出来的事物现象。第三，“体”指根本原则、内在目的等；“用”指具体方法、外在手段等。张之洞在《劝学篇·会通》提出“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的观点，表达的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中学为体，就是以“孔门之学”为根本，西学为用，就是学习西方坚船利炮等技术，为我所用。

“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是对体用关系的一种主张。“体用贯通”是现代以来才有的一种表达，而“明体达用”的说法源远流长。两者表达的实质内涵是一样的。学术界一般认为，北宋思想家胡瑗最早运用“明体达用”，但他本人并未有此提法，而是后人对其思想特别是教育思想的概括总结，即以圣贤之道教书育人，用于治国安邦之实践。以“明体达用”概括胡瑗思想，始见于元代张光祖《言行龟鉴》：“学者必以明体达用为本。”实际上，“明体达用”不仅体现了胡瑗思想的特质，而且也体现了宋明理学甚至整个中国哲学的思想特点。正如钱穆认为：“汉学派的精神在‘通经致用’，宋学派的精神在‘明体达用’。”“明体达用”就其精神实质，反映的是体用的一致性、统一性、

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采取什么样的事业态度、遵循什么样的事业精神、追求什么样的事业目标”的重大问题，科学标定了新时代党员干部修身立德、干事创业的价值尺度。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是一个有机整体，互为关联、互为作用、互为一体。其中，权力观是基础，带有根本性，对事业观、政绩观具有支配和指导作用。权力观异化，必然导致事业观扭曲、政绩观错位。事业观是权力观的一个方面，是权力观在事业问题上的应用和贯彻，是权力观作用于自身的集中体现。一般而言，有什么样的权力观，就有什么样的事业观。政绩观是党员领导干部事业观的核心内容。权力观、事业观共同决定政绩观，不同的权力观、事业观，导致不同的从政价值判断，从而形成不同的政绩观。同时，由于权力观、事业观是在政绩观的基础之上认识自身从政价值的，所以政绩观反作用于权力观、事业观，对权力观、事业观产生导向作用。总之，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三者之间既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又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我们必须一体领悟、一体把握。

人民性是新时代党员干部“三观”的根本立场。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清醒认识到，自己手中的权力、所处的岗位，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为党和人民做事用的，只能用来为民谋利。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不慕虚荣、不务虚功、不图虚名，切实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概括起来是两句话：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我们谋划推进工作，一定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把好事实

贯通性，类似的说法还有“体用一源”“体用一如”“体用一贯”“体用不二”“体用相即”等。

“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理论品格

我们既要明晰中国哲学上关于体用范畴的多重涵义，也要把握其在演变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引申的、拓展性的内涵，更要立足于具体语境理解其所具有的特定内涵。这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指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

为什么说文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鲜明品格？因为这一思想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又有“文化

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既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又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概要之，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思想理论层面的认识论，也有实践操作层面的方法论；既有宏观层面的规律性认识，也有具体层面的实践路径。

其一，习近平文化思想实现了“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深化了“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这便是“明体”。这里的“体”就是关于文化、文明以及文化建设的本质根据、根本原则等内容。比如，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把握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再如，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了“两个结合”的重大论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他还强调，“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中华文明发展规律是什么？核心一点就是，马克思主

义思想主题教育，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新时代党员干部“三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将其作为常修常炼的实践课、终身课，常常照镜自省、时时躬身践行、处处校正偏差。

正确处理党性与个性的关系，强化党性锤炼，做到“克己奉公、无私无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讲党性并非否定个性，党员身份决定了其个性必须服从党性。错位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根子在于背离了党性、丢掉了宗旨、抛弃了信念，放松了世界观改造和思想道德修养。这就要求广大党员干部不断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切实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矢志践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小我”融入“大我”，把人生追求和价值目标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项伟大事业之中，体现到为党和人民事业的不懈奋斗之中。作为一名政法领导干部，必须始终牢记政法姓党这一永远不变的根和魂，毫不动摇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矢志不渝践行党的初心使命，把真心爱党、时刻忧党、坚定护党、全力兴党落实到政法工作全过程各方面，确保“刀把子”牢牢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

正确处理好对上与对下的关系，强化为民思想，做到“民之所盼、我必行之”。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从来都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对党负责，就是对人民负责；对人民负责，就是对党负责。两者统一于对党和人民事业的高度负责之中。树牢正确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需要破除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错误倾向，深刻把握“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时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价值追求，自

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发生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又如，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了文化建设的基本遵循原则——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文化自信强调立足于文化主体性、原创性，不断增强文化发展的内驱动力，在构建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思想文化进程中，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开放包容强调着眼于文化开放性、吸纳性，不断提升对外学习吸纳能力，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吸收有益成果，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守正创新强调文化连续性、创新性，不断推进返本开新的力度，在继承与发展辩证统一的思想文化进程中，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

其二，习近平文化思想规定了“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这便是“达用”。这里的“用”就是关于新时代文化建设、文化工作的实践路径、方式方法等。“达用”也揭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所具有的“作用”“功能”“属性”等特点，即这一思想“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从实践操作层面

践力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最高位置，把人民满意作为根本标准。政法机关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必须把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作为最大的政绩，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深刻认识通往群众的路是用心走出来的，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真正做到民有呼我必为、民未呼我先为，让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正确处理“潜绩”与“显绩”的关系，强化实干担当，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既要能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作铺垫、打基础、利长远的好事，既要做显功，也要做潜功。这就要求我们深刻把握“潜绩”与“显绩”、当前与长远、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发扬钉钉子精神，脚踏实地干，尊重客观实际，按照规律办事，不求急功近利，“显绩”，而是要创造泽被后人的“潜绩”。政法机关处在对敌斗争最前沿、维护稳定第一线，也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政法工作每一项都是实打实的，来不得半点虚夸和浮躁，必须务实担当、谦虚谨慎，坚定不移把那些打基础、利长远、见实效、创实绩的事情抓好做实，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在政法系统得以创造性贯彻落实、创新性转化发展，推动更高水平的平安浙江、法治浙江以人民群众可见可触可感的方式实现。

正确处理好事与成事的关系，强化本领养成，做到“业务精通、能拼善赢”。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学思想、见行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不断提高推动高质量发展本领、

的方法论来看，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的文化使命，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了系统完备、切实可行的战略路径；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这“七个着力”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经世致用的特点。

其三，习近平文化思想实现了体与用、理论与实践、认识论与方法论的辩证统一。这便是“体用贯通”。“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理论品格不仅指习近平文化思想既包括了“体”的内容，又包括了“用”的内容，而且还指两者之间相互贯通的内在关系。王阳明说：“即体而言用在体，即用而言体在用，是谓体用一源。”这里所说的即体即用的观点，表达的就是体与用的统一、体用贯通的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独具的创新性和突破性的文化理论观点，与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实践举措，不是割裂的、外在的关系，而是相互贯通的、内在的关系。“体”（文化理论观点）决定了“用”（文化建设的实践举措），“用”体现了“体”。正如，“第二个结合”的理论观点必然决定了“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文化建设的实践路径，而后者也集中体现了、反映了“第二个结合”的思想真谛。再如，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认识上，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这一认识论必然决定了方法论——“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而方法论也蕴含着这一认识论。还比如，习近平文化思想揭示了文明交流互鉴规律，其在实践上的要求就是“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而这一要求所蕴含的或体现的正是文明交流互鉴规律。总而言之，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现了由体以达用、由用以明体的特点。

服务群众本领、防范化解风险本领，加强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养成，提振锐意进取、担当有为的精气神。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有对党和人民负责、对岗位负责的事业态度，而且要从党的科学理论中悟规律、明方向、学方法、增智慧，把看家本领、兴党本领、强国本领学到手，切实担起该担的责任、负起该负的职责，做到干一件、成一件。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政法机关肩负着重大使命任务，突围突破一刻也等不得、赶超跨越一步也慢不得。我们必须自觉加强学习、强化实践锻炼、提升专业能力，着力增强防风险、攻难关、迎挑战、抗打压能力，做到“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关头豁得出来”，努力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

正确处理好自律与他律的关系，强化制约监督，做到“崇法守纪、清正廉洁”。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是一条铁律；国家之权乃是“神器”，是个神圣的东西。公权力姓公，也必须为公。只要公权力存在，就必须有制约和监督。不关进笼子，公权力就会被滥用。这就要求我们在勇于自我革命的同时，更加坚定自觉地接受组织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来自各方的监督，接受纪律和法律的约束。政法机关行使着执法权、司法权，直接关系群众的切身利益、公平正义的实现，直接关系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对法治的信心。必须增强依法用权的法治意识，坚持在法治轨道上行使权力，切实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必须强化自我革命精神，健全完善执法司法制约监督和责任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让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成为一种习惯。

（作者系浙江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